

山东临淄河崖头西周墓出土原始瓷相关问题讨论

崔素云 秦超超



图一 临淄河崖头西周墓出土原始瓷豆 (M102:0075)



图二 临淄河崖头西周墓出土原始瓷豆 (M102:0076)

多与青铜器随葬，甚至姚河塄贵族还将一件原始瓷豆分为数个残片，分葬于不同贵族墓中，从而彰显身份地位。临淄齐故城东北部的河崖头墓所出原始瓷可能为齐国贵族迁都临淄营建大城之后来自周王室的赏赐之物。

年代推断 发掘简报根据河崖头西周墓出土青铜器推测该墓的年代为西周中期，但未对出土原始瓷进行类型学分析。下文将结合全国其他地区西周时期出土的同类器对河崖头原始瓷豆进行分析。在山东地区目前所发现西周原始瓷中，仅前掌大墓地M13:15、BM3:43原始瓷豆与河崖头村M102:0076相似。如果扩展到整个西周文化区，与其相似的还有房山琉璃河M52:5、M52:44，绛县横水墓地M3250:31，洛阳庞家沟，随州叶家山M65:160和M126:6，翼城大河口墓地M1:65，以及福建建瓯黄窠山遗址，福州市荆溪芝山遗址和武夷山竹林坑窑址等（图三）。此类豆不仅保留了商周时期原始瓷豆的基本特征，且普遍采用浅盘设计，盘沿有两周或数周弦纹，沿外饰有二至三组长方形组突。而与河崖头M102:0075原始瓷豆形制相近者，在山东地区仅见于前掌大BM3:4，除口沿外饰三个组突外整体形制基本一致。放眼整个北方西周文化则有数件原始瓷豆与之相似，如山西北赵晋侯墓M113:100、陕西张家坡M304:13、岐山贺家村M6:5、绛县横水墓地M3250:46等（图四）。根据年代判断，其中，山东滕州前掌大BM3和M13年代都应为西周早期；房山琉璃河M52属西周早期；绛县横水墓地M3250年代为西周早期晚段或早中期之际；随州叶家山M65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康昭之际，M126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康王后期；翼城大河口M1年代确定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康王晚期到昭王时期。因此，可以推断河崖头墓出土的两件原始瓷的年代总体处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源流推断 西周时期北方地区原始瓷出土较少，且多出现在重要遗址和贵族墓中，东南浙闽赣地区自夏时期开始便开始烧造原始瓷，至商晚期无论江西的吴城遗址还是浙江的东苕溪原始窑窑址群均达到了较大规模生产 and 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学界多倾向认为西周时期北方地区的原始瓷来自南方地区。黎海超通过全面对比西周南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后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瓷主要来源于江南地区的钱塘江流域，也有零星源于浙东、闽北地区，长江中游的鲁台山、叶家山所见原始瓷则可能直接源于西周王朝的分配”。同时黎海超还认为“北方大部分的原始瓷可能在江南地区

商代得到了延续。郑州商城二至三期均发现有一些祭祀遗存，如二里岗、南关外、人民公园、彭公祠……但存在祭祀遗址相对比较分散、规模相对较小等特点。小双桥遗址发现白家庄时期的祭祀遗存数量较多，祭祀功能完备，且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存在系统化的祭祀礼仪。

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分类

小双桥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分为直接继承性和间接继承性两类。

直接继承性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是北偏西（南偏东）布局模式。二里头遗址和小双桥遗址规划方向均为北偏西，而郑州商城却是北偏东。有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北偏西的取向一方面与地形有关，另一方面是为了面向郑州商城。殷人把东北方位当作吉向尊位，是他们不忘起源旧地的一种深层次的故土观念。既然商人尊东北的原因是为了不忘起源地、不忘先祖，而小双桥遗址北偏西（南偏东）面向郑州商城亦为面对祖先故土，一定程度上不属于违背祖制。

间接继承性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包括街区制布局模式、典型陶器和祭祀与礼仪活动。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青铜时代都邑，郑州商城至迟在白家庄阶段肯定存在以围合壕沟封闭的街区，小双桥遗址也已形成街区制布局模式，其应是传承于郑州商城，间接继承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一至三期和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均发现有夹砂中口罐、泥质罐、捏口罐、浅腹盆、刻槽盆、器盖等二里头文化因素器物，体现出制陶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从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一至三期祭祀遗存的不断发现到白家庄期祭祀礼仪的完备，表明商代早中期的祭祀行为与礼仪活动已较为成熟。

二里头文化因素持续发展的背景与原因

以上分析可知，小双桥遗址中包含大量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对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在白家庄期依旧强烈，原因有四。

一是夏商文化的传承性。商代早期在诸多领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部分因素，包括技术体系、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等。如小双桥遗址中发现的某些陶器，其制作工艺、造型风格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存在显著相似性，反映出制陶技术的传承与延续。遗址规划建设遵循的布局原则、功能分区理念，也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根源。小双桥遗址出土的祭祀遗迹、祭品组合等，与二里头文化祭祀传统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小双桥遗址通过战争、联姻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复杂的

考古

石器时代火烧石研究综述

刘畅

火烧石，是指因受高温加热导致烧蚀、变色或裂解的石块，在考古遗址中通常与火塘、灰坑、灶坑等遗迹相伴出现。作为史前先民热处理技术的考古物证，被广泛用于探讨食品加工、热能利用、技术演变和生计情况等领域。

对火烧石的研究主要通过三类途径展开：考古遗址出土的直接证据、民族志资料的间接佐证以及实验考古的模拟分析。本文试图回顾和梳理中国火烧石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展望未来研究的潜力与方向。

考古出土直接证据支持

鉴于田野考古出土的强力证据有限，学者们只能通过文献上的零星记载和部分民族学材料对火烧石进行研究。随着近年来田野考古的发展，学界内对烧石和“石煮法”的认知进一步深化，从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两个层面上给予证明。

黄河流域的初步识别

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烧石、烧骨多块。1965年河南许昌灵井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烧骨、烧石以及炭块出土。1980年山西县柿子滩遗址底砾层中发现动物化石、烧骨和灰烬。

2009年至2010年，在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中发现的石块堆积区，其中夹杂大量烧石碎块，学者判断此遗迹具有烧火功能。同时期的其他简报或报告，如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中发现的烧石，也多是一句带过而未见系统描述。

长江流域的考古材料 长江流域的三峡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存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其中包括并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重庆市巫山县玉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等，均有烧石、灰烬出土。武仙竹根据对“石煮法”的研究，对比和分析三峡并水湾遗址出土的“烧石”，推测其同样也是人类“石煮法”的遗迹。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片夹杂炭屑以及稻壳，有学者推测其与早期稻作农业人群的炊事或热石烹饪有关，可能代表“石煮法”的早期实践。郑云飞等在研究上山文化遗址陶片时发现陶片中夹杂稻壳，而刘莉则指出上山遗址陶器器表不见烟息痕，可能涉及热石烹饪的行为。

青藏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系统记录 在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火烧石的表现尤为突出，反映出该区域可能长期存在烧石烹饪的传统。

青海省黑马河1号遗址出土发现有火烧痕迹的花岗岩砾石、闪长岩砾石、炭屑以及灰烬；青海省共和县沟后水库附近的001地点，发现的小型灰堆，灰堆中的砾石零散分布，多有火烧痕迹，其中有两枚因受热开裂，推测为加热食物用的烧石。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居生活活动，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砾石数量众多、分布密集。一些活动面上发现的石制品表面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学者推测这可能频繁用火行为有关。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共出土1000多枚烧石，在火塘填土中，含有大量烧石和烧骨，并伴有厚约5厘米的纯炭层。

这些发现为研究烧石的区域分布和区域差异提供了宝贵实证。

进入21世纪，火烧石作为考古专题首次获得系统性关注。2006年至2007年，刘莉、高星等学者将“烧石—石煮法”作为研究主题，标志着该领域的转折。

刘莉的研究将植物质陶器与“石煮法”结合，构建起一套与“定居农业—陶器起源”传统论点不同的解释系统。她强调陶器诞生之初并非源于农业生产需要，而是为满足狩猎采集社会中对食物、营养加工及移动便利性的需求。其研究集成实验考古、民族志研究、考古现场数据等多种方法论，展示陶器研究中“功能—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技术演变提供更动态、更复杂的视角。

而水洞沟12地点的研究，是首次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系统确认“烧石”作为间接用火工具的存在。高星等人对遗址出土的13000余块破裂石块进行了形态学、尺寸分析、岩性成分等系统分析，指出其非自然风化、非炉灶圈石，而是经过人工选择、高温烧烤与入水骤冷后的产物。进一步的模拟实验则基于石英砂岩和白云岩等与遗址相同石

材，设计不同火温与冷却方式，复现了“加热—入水—破裂”的过程，证实这些石块被用于加热液体。实验明确指出石灰岩等材料因爆裂或污染水质而被排除使用，反映出古人类对石材特性的经验性选择。

文献与民族学材料

我国学界对于火烧石的讨论和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民族志材料提供的间接证据，将少数民族使用石头烹饪食物与史前先民的“石煮法”紧密联系。我国多个少数民族聚集体至今仍保有“石煮饭”“热石汤”等传统炊食方式。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以石煮食亦有片段记述。如《礼记·礼运》中记载“燔黍捭豚”，郑玄注释称：“释米俾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意指在尚无釜甑前，先民便已将浸泡后的谷物或肉类置于热石上烹饪。这种直接在石头上烙烤成熟的方法，是我国古老的“石上燂谷”法。

根据民族学材料，“石煮法”作为一种古老的烹饪方式，其发展的延续性是传承至今的，而其地域性则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东北、华南等各个地区。

清代方式济《龙沙纪略》中曾记述：“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水中数十次，漚而食之。”其意为东北少数民族在缺乏陶器的情况下使用火烧石加热木制容器煮食的场景，这显然是一种成熟的“石煮法”形式，为考古学中火烧石的功能解释提供了佐证。

实验分析途径

由于火烧石通常非人为有意制作，传统石器分析的方法难以适用。近年来有学者尝试运用以下技术手段：构建模拟实验，复现史前社会石料热处理的完整流程；辨别外部特征和显微观察，包括油脂光泽、石料破裂、颜色变化等现象；石料力学性能分析，发现经过热处理的石料内部出现了局部化的损伤破坏，呈现多次开裂现象。同时在实验中，辅以XRD/XRF、热磁性等分析技术，丰富实验结果。但目前这些方法在国内仅见于个别研究项目和材料分析实验中。

全球视角下的烧石研究

在欧美地区，关于烧石的研究已有较为系统的进展。爱尔兰著名的烧石坑遗址（Fulachta Fiadh），其结构通常由一个水槽与外侧火塘及石堆组成，通过向水槽内周期性投入加热的石块，以实现间接加热的目的。学者如Alan Hawkes认为，烧石可能不仅用于烹饪，也可能涉及纺织、皮革处理等多种社会性活动。此外，瑞典、瑞士也有类似的遗址（burnt mounds），这些遗址的年代多集中于青铜时代，但相关的热处理技术可能更早已出现，且存在于更广泛的区域。

在北美，早期烧石的记录主要聚焦于平原与西北海岸的原住民。Alston V. Thoms等通过归纳民族志与考古资料，指出生活于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广泛使用烧石进行植物、肉类与水的加热处理，同时形成大量的烧石堆积。James M. Skibo等则关注烧石与陶器技术的起源关联，指出“石煮法”可能与陶制容器热稳定性提升有关。

实验考古也是国外学界分析烧石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Laura Short等通过便携式拉曼光谱分析烧石的表面残留物，鉴定出多种植物性成分。Andy Langley等的最新研究则从材料选择的角度切入，发现如石灰岩等石材在高温处理后会显著改变水的pH值，进而影响食物的味道与营养吸收。

火烧石作为人类控制火、使用火的重要物质证据，是研究史前热处理技术、食品加工方式的关键线索。在国内，火烧石的出土频率和文化分布表明其在史前社会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功能与意义。虽然当前的研究尚不系统，但已具备良好的考古基础与民族学材料补充。可以肯定未来通过更系统的考古识别、跨学科方法与实验模拟等途径，火烧石研究有望在揭示古代生活方式、技术演进与环境适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论郑州小双桥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师东辉

小双桥遗址中包含丰富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不仅体现在遗址的规划与布局、典型陶器中，也在祭祀仪式方式有所体现。小双桥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分为直接继承性和间接继承性两类。在夏商文化的传承性、二里头文化部分因素的先进性、商代中期“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白家庄期商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共同作用下，小双桥遗址呈现出浓厚的二里头文化风格。

小双桥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小双桥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遗址规划与布局、典型陶器特征、祭祀与礼仪活动三个方面。

遗址规划与布局分遗址规划方向和街区制布局模式两个方面。二里头遗址整体规划方向为北偏西（南偏东），内部重要遗存具体规划方向也多为北偏西。小双桥遗址整体规划方向同样为北偏西（南偏东）。内部重要遗存具体规划方向多为北偏西，如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宫城墙基遗存、“周勃墓”夯土台基、V区F3等。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其为“多网格”式布局。郑州商城内城的书院街存在以围合壕沟封闭的街区。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分5个宫城单元，其间以沟、墙为界隔，存在不同功能区划且有街区空间分隔。

典型陶器特征方面，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夹砂中口罐、泥质罐、捏口罐、浅腹盆、刻槽盆、器盖和陶鼓形壶等，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二里岗文化一至三期亦发现有部分同类风格的器物，应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白家庄期，小双桥遗址新出现了具有明显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鼓形壶，这是二里岗文化一至三期尚未发现的。典型陶器的相似性表明二里头文化对二里岗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铜器方面也有表现，如小双桥遗址的铜觚、爵、斝，器形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相近。

祭祀与礼仪活动方面，二里头文化的祭祀习俗在